清朝皇子教材探究
——以清宫藏教材类书籍为考察点

On Textbooks for Qing Dynasty Imperial Sons: An Examin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Qing Imperial Palace

李士娟

Li Shijuan

内容提要：

清朝最高统治者,为了培养自己子孙后代的品学、才识，对其进行严格的培养和训练。在教育制度上采取对贵族子弟比一般学校更严格的规制，还专门建立了皇家学校“上书房”，为皇子们选择最好的老师，钦定书籍作为皇子皇孙们的学习教材。但如何确定为教材，皇帝又敕编哪些书籍作为教材，以及这些教材的编纂有何特点，本文作者拟以清宫藏书为例，对上述问题作一分析探究。

关键词：

清宫藏书　皇子教材　教材确立　编纂特点

ABSTRACT:

The supreme rulers of the Qing dynasty educated and trained their sons and grandsons in a strict manner to develop their characters and learning. The Qing imperial family adopted an education approach stricter than those applied to average aristocratic children, founded “The Imperial Study” as the palace school, appointed the best tutors and mentors, and endorsed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imperial sons and grandson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mperial palace collection of books, discusses such issues as how the textbooks were chosen, which books emperors commissioned for compilation a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special procedures of the compiling.

KEYWORDS:

Qing imperial palace collection of books, textbooks for imperial sons and grandsons, adop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special methods of compilation

清代最高统治者，为了培养自己的子孙后代成为接班人，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培养和训练。在教育制度上采取对贵族子弟比一般学校更为严格的管理规定，为皇子们在宫中建立了皇家学校“上书房”，选择最好的老师，并钦定诸书作为皇子皇孙们的教学教材，足见清帝对“天朝”及皇室命运寄托的期望。但如何确定教材，皇帝又敕编哪些书为教材，以及这些教材的编纂有何特点，本文作者拟以清宫藏书为例，对上述问题作一系统分析探究。

一 清代皇子教材如何确立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在确立国家教育理念及与教育相关的教材时无不来源于皇帝本人意愿。统治者的手段和谋术不仅来源于现时的政治启示，更需要从历史的经验或教训里得到谋略，而这些经验大多都在历史的典籍里，从中可以寻得治国之道。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清王朝统治者，他们深知这一点，必定要选择学习汉民族文化。清统治者更期望能通过对文化的统一来达到思想上的控制，以实现国家的稳定。也因此统治者极其重视本民族的文化教育，尤其是以皇族为中心的满族贵族教育，他们把学习汉族文化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只有努力学习汉民族文化，方能打开汉族历史悠久、蕴藏丰富的思想文化宝库，也才能为之所用。而对自己未来的接班人，不管将来是为君还是为臣更要严格教育管理，与此同时为他们专门制定符合继承人标准的教育及教材体系。

（一）因国策的制定确立皇子教材的社会普遍性

清朝是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要尽快地融入汉民族及文化中，语言是最重要的。满族文化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以前还处在很原始的水平上，当努尔哈赤逐步统一女真各部，建城赫图阿拉时，满族文化才开始兴起。在努尔哈赤以前，满族因与蒙古族交往甚密，曾一度借用蒙文。为提高满族的文化素质，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二月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以蒙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满文。后金天命六年（1621 年）努尔哈赤占领辽东地区，即下令在八旗中设立学校，令子弟学习，但当时的教育发展比较缓慢，主要还是满、蒙语言文字方面的学习，再有就是学习骑射。

皇太极时期发展教育的举措，首先是在天聪六年（1632 年）三月，清太宗皇太极命达海改进满文，改进后的满文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解决了上下字雷同之处，更有益于学习。其次是修建文庙，修建文庙的意义在于对以孔子为代表的汉族和知识分子的尊重。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这一点充分反映了后金政权开始以汉族儒家文化为教育的核心。后金天聪五年颁布读书令：“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如不愿教子读书者，自行启奏。若尔等溺爱如此，朕亦不令尔身披甲出征，听尔任意自适，于尔心安乎？其咸体朕意毋忽！”[1] 皇太极这道读书令主要针对贝勒大臣的子弟，但同时对后金的教育事业起到推动作用。现在史料虽无明确记载，但从当时一些汉官的奏议中仍可反映出读书令的影响，此时已开始有了具体学习的措施。天聪六年汉官王文奎在奏议中提出：“其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显明者详诸史籍，宜于八固

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十，第 20 页，清乾隆四年内府写本。

山读书之笔帖式内，选一二伶俐通文者，更于秀才内选一二老成明察者，讲解翻写。”[1] 由于满文创制时间短，还谈不上编写教材，皇太极遂采用翻译书籍的方法，来解决满族人学习汉文化的需要。据《啸亭续录》记：“崇德初，文庙（皇太极）患国人不识字，罔知治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及定鼎后，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拣择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无定员，凡《资治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诸书皆翻译清文以行”[2]。这说明，此时期除语言文字学习外，逐渐增加了儒家典籍的学习。

顺治元年（1644 年）清王朝定鼎北京，入关之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处于焦点，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发展教育，提倡儒学，以期在意识形态领域达到文化专制。顺治帝宣布：“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3]，这是清入关首次确立文教政策。之后则立即大规模开展对八旗子弟的教育活动。从顺治至雍正，各类八旗学校相继建立，而所学内容，八旗子弟及社会上官私学习机构等一直都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以程朱理学对经典的解释为主。凡是读书之人从小在蒙学塾课中是以这一系列作为教材来背诵的，在进入成年后，则是以这些理论著作作为考试的基础，不学这些，几乎是与入仕无缘。所以皇子所学的经书、史书及性理方面诸书几乎是与国家各阶层人士所学之内容相同，臣民掌握的知识，皇子们必须首先学习，这也是皇子教材在选择上具有社会普遍性的原因。在国家确定其教育思想的同时，其皇子的学习教材也相应地确立了。

（二）皇子身份确定其教材的特殊性

清朝入关后，皇子教育在制度上趋于完善，逐渐建立起上书房皇子教育制度，对皇子学习内容也逐步有针对性地增加。“‘尚书房’（后改为“上书房”）之名始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曾设在紫禁城内南薰殿西长房、懋勤殿、咸福宫和兆祥所等处，雍正时设于乾清宫东南庑北向，以后固定下来[4]。从那时起，宫中增添了一个“皇子学校”。雍正帝为勉励皇子读书，亲笔写对联一副：“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乾隆帝即位后又题写了“养正毓德”匾额和“念终始典于学，于缉熙单厥心”的对联，悬挂在上书房。在上书房每个皇子都配有汉师傅，还有从满、蒙大员中选出专教满、蒙语文师傅，名为“谙达”（满语）。从留存资料看，皇帝颁旨供皇子学习的具体书籍只是很少的几部，大多只是划定符合国策的教育方向，诸如上述内容。那么皇子到底读哪些书呢？我们可从《乐善堂全集》一书中窥之一二。该书是乾隆帝做皇子时所写的文章，即位后便把这些文稿辑为全集刊刻颁行并以“乐善堂”（乾隆帝做皇子时的书房）作为书名于乾隆二年（1737 年）武英殿刻成。此书卷前有乾隆二年御制序，并有雍正八年原序、和硕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允禧等多人所作的序，最主要的是有皇子的老师们为此书刊行所作的序，从序中我们了解当时皇子们所学习的绝大部分教材内容。如皇子的老师朱轼在该书序曰：“皇四子、五子年甫十三岁已熟读诗书，四子背诵不遗一字，已乃精研《诗经》、《尚书》、《易经》、《春秋》、《戴礼》宋儒性理诸书，然后旁及《通鉴纲目》、《史记》、《汉书》

1 《天聪朝臣工奏议》，王文奎《条陈时宜奏》。转引自《满族文化史》。

2 昭琏撰、何英芳点校：《啸亭杂录续录》，第 396 页，中华书局，1997 年。

3 赵尔巽：《清史稿·选举一》，第 3114 页，中华书局，1976 年。

4 《国朝宫史》卷之十二《宫殿》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年。

八家之文”[1]。另一位皇子老师蔡世远序曰:“皇子仁孝、聪明、逊志时敏，自四子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诸书以及古文渊鉴，名臣奏议之有关于学术治道者，莫不讲贯习复蕴之”[2]。此序出现了“名臣奏议”，这些奏议一般是历朝历代著名高官名臣的重要上奏文章，学习此内容能考究历代政治得失、典制沿革、用人赏罚等，还可以学习治国的方方面面。而从该文集所载乾隆帝所写诸文中，亦可以看到其所学内容。文集分为论、序、记、跋、杂著、表、拟、制义、赋、诗各类，它集中反映了涉世未深的年轻皇子弘历的政治理想、对历代帝王治国经验的总结，以及其生活情趣，其中浸透着正统儒家的教条和理念。

从上述书中所载学习内容，除学习满、蒙、汉等文字外，就是系统学习四书、五经、史书、性理和通鉴之书，更主要的是学习如何治国理政，这都是将来为君为臣所必须掌握的。治理朝政经验得失，国家兴衰治乱之书是上书房教读的重要内容。以下笔者依皇子学习过程，试以清宫存藏与教材、教辅相关的书籍划分诸类，以为系统分析探究。

1. 启蒙

启蒙类教材主要是针对年幼皇子进行启蒙教育的书，诸如《帝鉴图说》的重刊。该书原是明代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为年仅十岁的小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编写的教学课本，全书分为“圣哲芳规”和“狂愚覆辙”两篇，由一个个小故事构成，分别讲述了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剖析了历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祸。告诫人们要以史为鉴，在做每一件事都应该考察古代并验之于今。其中每个故事都配以插图，形象生动。还有明代留存下的《养正图解》一书，明代焦竑撰，清代也是多次刊印，成为皇子教材。此书也是专供皇子们学习古代帝王、圣贤们的嘉言善行，了解历朝兴衰成败的史事，此书同样绘有插图，寓教于乐使皇子们能从中学习到治国之道和化民之方。此书在重刊御制序中明确表明，要求他们致力于修身、齐家、治国。此类书籍还有《圣迹图》等。上述诸书皆类似于今天的连环画，以图附说的启蒙读物，可读性强，便于幼小皇子们学习。因此明清多次刊刻流传，到清代也作为教材读物。

2. 语言

语言学习对皇子教育是首要内容。满族人的语言使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母语阶段、满汉双语阶段以及汉语阶段。为适应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需要，同时也便于满族人学习，清初曾由官方组织人力编纂了大量的语言学习类的书籍。针对满文初学者的如，《满洲十二头》，清满文抄本，是清代教习初学满文教科书之一。《一百条》，清刻满汉合璧刻本，是为满汉文对照日常用语，专供八旗子弟学习满语会话，主要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事件。还有《清文启蒙》一书，为满族人舞格撰，雍正八年（1730 年）刻本，该书是清代刊行最早的教科书，之后一直到清末都是满族人学习满语的必备教科书。从该书的刊刻时间来看，满族人在语言学习上，满族上层社会要比下层社会早很多年。因为在康熙年内府已经刊刻了康熙帝创作的诗歌、纳兰性德填写的词等，这时间已经是八旗上层社会大量使用汉语的阶段了。为了培养蒙古八旗子弟，教习满蒙文翻译，还特编《蒙文十二字头》，清蒙文抄本、《蒙古语》清蒙汉合璧钞本，均为学蒙语的教科书。

另外，清末宫廷特为溥仪开设英文课，师傅为英国人庄士敦。清宫藏《英文录闻》一书，是老师专为溥

1 《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朱轼序，清乾隆二十三年武英殿刻本。

2 《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蔡世远序，清乾隆二十三年武英殿刻本。

仪学习英文编写的教材，书中英汉文字书法纯熟，应为溥仪的老师所写。全书内容简单明晰，别具一格，非常适合初学英文者使用。

3. 典籍

儒家经典是皇子们主要学习的典籍。康熙时期儒家经典的学习逐渐系统，四书五经等经典都有刊刻。康熙帝还以讲明学理为先务，令儒臣把日日为其进讲的经史文学的释文纂辑刊刻成书，供全国生员学习。如《日讲四书解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春秋解义》等，也便于皇子们学习。康熙帝还特命儒臣李光地等校刻《朱子全书》、《御纂性理精义》、《大学衍义》等程朱理学名著，并且孔孟经书和程朱理学著作几乎全被译成满文，也是为还没有学会汉文的满族人学习之用。雍正皇帝钦定了《书经传说汇纂》，该书是清王顼龄等奉敕撰，雍正八年内府刻本。此书形象地提供了关于《尚书》中涉及的谱系、地理、天文、历法、音律、典章等有关资料。历史类典籍有《通鉴纲目》、《史记》、《御览经史讲义》、《二十四史》等。文学方面比较重要的典籍是唐宋八大家文集，还有《古文渊鉴》、《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我们从大量的刊刻汉文典籍来看，可以说此时教育教材及教辅等学习内容已逐渐成为系统。

4. 史论

有关记述历史及对历史评述之书为史论。顺治年刊刻历史类有满文本《辽史》、《金史》、《元史》，还有明内府经厂刻本《历代名臣奏议》，该书载历代典章制度之沿革，政治得失之故，实可与《通鉴》、《三通》互相考证，也是皇子们读书教材。还有帝王圣训，圣训即皇帝的谕旨，是研究诸帝伦理道德、哲学思想、治国策略及历史的重要资料，这是皇子必学的，以为今后施政做准备。

5. 品行

品行是关乎未来继承人的品德、修养、性格等多方面，也是为皇帝所重视的。清初刚入关，顺治帝特编撰了《资政要览》一书。此书是以孔孟学说为基础，从历代的经、史著作中辑录有关政事的论说，加以发挥引申，并亲自作训释。分别阐述了“君、臣、父、子”之道，“齐家治国”之方。其指导思想规范群臣百姓思想、行为准则，也是要皇子们学习遵守的，目的是为加强思想统治。顺治帝还御撰了《范行恒言》、《劝善要言》、《劝学文》等，这些有关品行之书的刊刻是与其教育理念息息相关，符合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还有雍正帝敕修《圣祖庭训格言》一书，该书是雍正帝及其弟兄追记其父皇康熙帝庭训之话，以追念父祖之圣德，教导兄弟子孙如何处事，刊颁皇室子弟，令其学习。该书内容十分广泛，上涉天象，下及地舆。大到安邦治国之道和为君之方，小至饮食起居的细微琐事均予训导，并劝勉皇子们生活要节俭、自制，行为不得放纵，要勤勉读书，勤于政事，并反复讲述孔孟之道。此书实为治家、治国、教子之作。

6. 其他

由于西学并没有连续性的教育，所以没有单独列为一类，而归为其他。西学的学习是因康熙帝本人不拘泥于旧的知识，不断追求新的知识，并对西方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从而也引领皇子们接触了西学，可以说为皇子学习开辟新的科目。康熙时期在宫廷先后聘用了西方传教士，有比利时的南怀仁、葡萄牙的徐日升、法国的白晋、张诚、意大利的闵明我、德格理等。他们以内廷行走的身份，进讲诸如数学、天文、地理、音乐、拉丁文、医学等方面的西方知识。有几位成年的皇子都直接参与学习，具体学习教材虽没有留下记载，但我

们可从诸皇子参与编纂诸书存世的成果窥其所学习内容。如允祉，清圣祖康熙帝第三子，曾开蒙养斋馆。主持编撰有《御制数理精蕴》、《数表》、《度数表》，康熙皇帝将《御制数理精蕴》与《历象考成》、《律吕正义》合为一部，赐名为《律历渊源》，成为反映当时中国自然科学最高水平的带有总结性的科学巨著。允祹，清圣祖康熙帝第十二子，撰有《律吕正义后编》。允禄，清圣祖玄烨第十六子，乾隆间充算法馆总裁、玉牒馆总裁，总裁《七政书》。精数学，通乐律，承父指授，率儒臣编纂《律历渊源》。这些书籍的编纂都是皇子学习后的成绩，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其专为皇子们学习之用的西学教材显现的成果。

从清朝刚入关顺治帝确立文教政策，到康、雍、乾三帝的不断推进，文教政策已基本成为有清一代不断延续的定制，体现在皇子教材上的选编上没有太多的变化。直至清末西学的广泛传入不可避免地对上书房制度产生影响，上书房教育制度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开始重视西学。如翁同龢在为光绪皇帝讲授四书五经之外，增加讲授了魏源的《圣武记》、《海国图志》等西学书籍。纵观清代皇子教材的构成，可以说集政治、文化、教育意义于一体，并且采用满汉两种教育方式，让知识思想相互融合、互补，是皇子教材选编上的一大特点。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与清朝教育国策息息相关，而教材的不断演变直接反映出教育的发展过程。

二　清代皇子教材的编纂特点

清代历朝皇帝在为子孙御选、御编教材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学习对象，其教材的编纂具科学性、实用性，并把握了一定的规律，遵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达到教育与语言、知识与培养伦理道德紧密结合起来。

（一）教材的编纂针对性强

教材编纂具有针对性。首先是教材在设计内容及编写过程中以学习者为中心，针对学习者的年龄及学习目的，选编适合其特点和需求的教材内容。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历经沧桑流传后世的典籍文献成为后人珍贵的历史遗产。如何能读懂这些典籍，对于年幼的皇子们还是晦涩难深的。皇子们在读汉文书时，有年幼与年长之分。年幼的皇子初学主要还是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为主，年长一些稍微识字后就开始读四书五经。如何把这些知识即生动又形象的教会给尚在幼年的学童，师傅们依教材内容为皇子、皇孙或幼帝设计一些形式新颖，容易接受的教辅教材。如清宫存藏《圣迹图》一书，清乾隆十二年（1747 年）于敏中写绘袖珍本。此书应当是皇家子弟接受儒家教育的启蒙读物，封面首页绘至圣小像，然后是正文。撰绘者是皇子的老师于敏中，他依据《论语》、《春秋》、《史记》、《礼记》和《孔子家语》诸书的内容，以时间为序，描述摹绘了孔子一生的传说言行事迹等，既所谓“圣迹”。该书以图为主，墨笔描绘，线条柔美，楷书精写，体现出清代翰林词臣们高深的文化艺术素养和绘画水平。阅看此书会有一种书画一体，内容与知识很好的融为一体，使人过目不忘，让学童在欣赏书画之娱中读懂学会。因此说，清代蒙学教材充分考虑了启蒙时期的寓教于乐的特点。

还有把《三字经》制作成棋子一样的形式，可以辅助教学，让学习充满趣味。而针对成年的皇子们要读《资治通鉴》、《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还有《御览经史讲义》、《二十四史》、《名臣奏议》

等。因此教材在选编时都充分考虑到年龄，特点鲜明具科学性。

（二）以多功能的观点选编教材

教材在每个时代以其时代特点都会有所区别，但大都包括品行教育、知识教育。品行教育方面的著作，占清代教材书籍中相当大的比重，可以说是教育的核心，如何把教育思想贯穿其中，需要采用何种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才能达到教育目的，这里我们从一部书的选编可看到，即清宫存藏的清代诸帝御选《养正图解》一书。其教材采用越是简便有效的方法，越容易为人所接受，一书兼有多重功效，其效果就显著。

此书原为明万历初年，为了适应幼帝学习的需要，焦竑在任皇子讲官时，为劝导皇长子朱常洛续封建道统而编撰的，这是一部专门教导皇太子为君之道的教科书之一。讲官特辑录周文王至宋代的传说典故，专门采辑古代有借鉴教育意义的皇太子的事迹编成此书，供皇子阅读学习之用。其内容既包括思想教育，也包括品德和行为规范教育。为提高自己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培养皇子的积极性，书中还有绘图 60 幅，以图解形式通过历史典故、古人事迹宣讲忠君、孝悌、诚信等封建伦理道德及言论行为规范，竭力阐述儒家的纲常观念及仁、义、礼、智、信思想，劝勉皇子从细微琐事入手修身养性，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是书初成呈万历皇帝御览，被列为皇室启蒙读物。清代又得到乾隆、嘉庆、光绪三帝的青睐。乾隆帝亲自作了《御题养正图诗》六十首，嘉庆帝亲自写了《御题养正图解》六十语，至光绪帝亲自颁诏命武英殿刊刻。此书历经明清两朝皇帝和宫中人学习，因而版本众多。从众多版本中不难看出，作为培养封建统治继承人的教材，能被统治者所采纳，是因其教材呈现的显著效果而为之。皇子们通过此书可学习语言、历史、绘画、儒家经典、从政处世等多层面知识，一书兼得多种教育功能是该书最大特点。

纵观清代皇子教材，其特点是教育目标与教育宗旨的最直接体现，是皇家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授。清皇子教材又是特别的，它引领了社会教育的方向，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范例，具有实效性与科学性。其实效性体现在教材内容的编排具有很强的连贯性、综合性，使教育与知识及培养伦理道德紧密结合。针对性是在对待不同年龄段的皇子选编教材上，以培养能力为目标，深入浅出，充满趣味。通过多年的教育，这些皇子皇孙们中一些人基本上具备了成为储君的素质，皇子们在学识、品性、意志、能力等方面或有比较出色的表现，显现出的成果是皇子们多有各专长，这不能不说是与其教材编选具有的科学性有关。这一点对于我们当今的教材尤其是文科教材编选上，以突出其现代核心价值观念作为教育目标，亦是有可资借鉴之处。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责任编辑：赵中男）